



近距离中的疏离,远距离中的亲密。这两句话,就道尽了我与外祖母之间奇特的关系。

童年时,到外祖母的家去,总看到她在忙。白天去,她忙于缝纫;一双手,上上下下地移动着布料;一双脚,在踏板上不停地踩呀踩的;手和脚,同样地专注。就这样,一袭袭“会说话的衣裳”,便活灵活现地缝就了。顾客穿上之后,惊喜地发现,外祖母缝的衣裳,总会扬长避短地说“出她们身材的优点——瘦弱者看起来窈窕飘逸,秀气无比;肥胖者则显得珠圆玉润,福气无限。

客似云来,她应接不暇。每当别家的祖母忙忙碌碌地在厨房以精湛的厨艺为儿孙制造一缕缕氤氲的香气时,我的外祖母却把自己“定格”在缝纫机前,在“扎扎扎、扎扎扎”那千篇一律的声响里浮浮沉沉。有时,伙伴埋怨她家祖母像一架坏了的录音机般唠叨不休时,我心里总羡慕地想道:嘿嘿,那绝对比“扎扎扎、扎扎扎”的声音来得动听!

晚上,到外祖母家去,看到的,同样是一个“冷冰冰”的外祖母;她依然是一尊塑像,不过,这时,她面对的,不再是缝纫机,而是书桌。

在那荧荧的灯火下,温暖的书香好似云絮一般包围了她。和坐在缝纫机前的那个人相较,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当她缝衣时,脸上不苟言笑的专注,有着为稻粱谋的辛劳;然而,当她执卷而读、执笔而写时,她是她自己,她完完全全为自己而活,脸上因此便绽放了一种蔷薇花瓣的流光溢彩,那是一种不属于她年龄的亮光。

由出世而至离开山城的那八年里,外祖母于我而言,仅仅是皮影戏里一个

不真切的影子,我们同样住在怡保,可是,我们的心,却像搁在不同的星球里,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移居新加坡后,在那个没有电邮和手机的年头里,外祖母和母亲,靠着鱼雁往返互通信息。我升上中学后,有一天,在外祖母的信笺里,母亲发现多了一张附函,呵,原来那是写给我的。

从那天开始,祖孙俩隔着四百公里的距离,开始了亲密无间的交流。信笺里,永远没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反之,它们像是一艘艘载满了书籍的轮船,频繁地驶进了我思想的港湾里。

这时的外祖母,已从“皮影戏”里走了出来,成了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我从外祖母那秀里秀气的字迹里,看到了她坎坷的一生,体会到了她的痛苦、挣扎、焦灼;我也同时看到了她的快乐、渴求、寄望。

外祖父暮年时生意的失败,她只当是命运多舛,为了负担家计而终日操劳,她毫无怨言;可是,外祖父中年感情的背叛,却是她一生永远无法痊愈的伤与痛。她在时间的夹缝里,逃进了文字的乐园,享受现实生活中无法给予她的大快乐。与此同时,她又深切地感觉暮年已近,剩余的时光不多,于是,只好和时间拼命赛跑,哪怕只有一分半秒的闲暇,她都要去感受文字温润的光泽。

我是在成长以后才慢慢理解了外祖母复杂的心态的。

有一回,外祖母从怡保到新加坡小住,我给她买了一摞书,她眉眼闪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璀璨笑意。在这一刻,我忽然想到,文字,其实是她心灵的医生;至爱的丈夫背叛了她,可文字却一生一世对她忠心耿耿,她于是把所有的爱转移给了文字,借此来抚平那份摧心的痛楚。



董鼎山在海外中国人中算是一面旗帜,很多今天的名人都是读他的书成长或借他来了解西方的。

在董先生的晚年,我曾应邀撰写他的口述史。老爷子是个有浪漫情怀的人。即使90多岁了,谈起风光事仍然不减当年勇。

“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娶洋妻子过了一辈子吧?”我虽然莞尔,但并不想窥探前辈隐私。没想到他却侃侃而谈:“我不是不想娶中国人,是只能‘望

梧桐树下

——卧波堂随笔

老姜

我家窗前有棵梧桐树,它是我的童年伙伴。挺拔的树干壮硕平滑,灰绿底色上斑驳的浅青。巨大的树冠遮天蔽日。一片片、一层层、一串串的树叶,犹如大大的巴掌,微风吹来时就像小小的精灵,欢快地舞动着。球状的果实如同悬挂着的铃铛,故俗称为悬铃木。

春天,梧桐树爆出嫩绿,用丰子恺先生的话来说便是“梧桐绿意上纱窗”了。经过园林工人精心修剪后的树丫上会绽放出生命的气息。小学校就在路边,背着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心里会萌发出,新学期要好好努力,争取有一个好成绩的念头,只是总不能尽如人意。

夏日,茂密的树冠遮满了整个窗户,只是在晃动时,偶然会透进一线阳光。暑假期间几乎没有作业,白天傻傻的呆在家中,耳边充斥着蝉鸣声,说不清楚究竟是烦躁,还是寂寞。每到这个节气,绿化所就会派车来打药水,只要听到轰鸣的马达声,赶紧关上窗门,这时呆在家里就像被关进了蒸笼。

秋天到了,几乎在一夜间。飘落一地梧桐树叶,是一道金色的记忆。在放学的路上,撑一把黄色的油布伞,穿一双母亲新买的黑胶鞋,踏着满地的枯叶,沙沙作响。总会有一种酸楚涌上心头。小小的我对上海的秋雨特别的敏感,长大后读到“独自徘徊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才懂得这种敏感不只属于我个人。

上海的冬天,阴阴的冷。当年还经常下雪。待到化雪时节,就会有彻骨彻肺的感觉。望着窗外的光秃秃的梧桐和残雪,如今回想起来应该不是凄凉,而是那种凄美。当北风起时,梧桐树会绑上寒御的稻绳,在冬日的阳光下,给人一种温暖。

1956年上海老城厢辟通南北干道,称为河南南路。我家从晏海弄动迁到河南南路400号,那时我才三岁,门前的那棵梧桐树只有胳膊那样粗。到1960年我上学时便有大腿一般粗了,待到1970年我离开上海上山下乡时已经长成胸围那么壮硕了,直到1980年我返城的时候即便伸直双臂也抱不过来。可以说门前的这棵梧桐树承载着我太多童年的记忆。如今,老房子已经被拆除,而这棵几乎与我同龄的大树依旧苦苦地守望在那里,仿佛仍然在等着我的归来。



梧桐树下 (中国画) 沈雪江

“有理说理,有话讲话,哪个怕哪个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新公房,终于有了抽水马桶。楼和楼之间隔离近,近到能看到对方的厨房,要检查人家每天桌上的饭菜,怕也是做得到了。

16号楼的二楼有兄弟俩。生得都好。清秀些的是弟弟,浓眉大眼的一个,是哥哥。邻居们看大眼成天在家,好生疑惑。渐渐地也就听说了,大眼一度失恋以致精神失常。这倒让四邻的孩子害怕起来。不过,大人孩子们都发现,大眼不危险。他顶多是隔三差五冲到阳台上大喊:“有理说理,有话讲话,哪个怕哪个啊!”他嗓音高昂、洪亮,语速急。若不是因为老重复那几句话,说的倒是头头是道。

邻居们就常立在自家的阳台上点头:呆子说得对!呆子妈是个清秀女人,对谁都和气。呆子发病要喊两嗓子时,能看见她缩在里屋的小板凳上,一动不动,屏息静气。大家刚搬来时,呆子妈也喜欢在阳台上 and 邻居招呼两声。呆子在阳台上喊的次数越来越多,她就变得难得露面了。

每幢楼极其相似,访客走错门的不少。有时误敲了呆子家的门,呆子也彬彬有礼。来人少不得抱歉自己走错,也顺便问一句,某幢楼到底是哪一排:“就是后头一排,就是后头一排,就是后头一排。”呆子是,无论人家找谁,他都这么连说三遍。来人听他连说三遍,心头狐疑,感觉苗头不对的有;糊里糊涂,道了谢,再走冤枉路的也有;不过,也有撞对的。

转眼弟弟到了恋爱年龄。有女青年跟弟弟回家。女青年来得多了,就结了婚。那时结婚,不兴跟男家要一套房的,男家有一间屋就不错。所以,这一家三室一厅的房里,添一个新媳妇而已。

弟弟有了媳妇,呆子跟在妈妈身后吵:“弟弟有,为什么我没有!”弟弟有了孩子,呆子竟然把要媳妇的心忘了。呆子喜欢那孩子,喜欢抱那孩子,抱得紧紧地,当个命!

一年一年,呆子妈病了,走了。呆子没了最会照顾他的人。记不得是哪一年,呆子也死了。谁也没在意。是有人从外地回这新村,四处沉寂,想起呆子气出丹田的声音:“有理说理,有话讲话,哪个怕哪个啊!”不由得问:怎么不见呆子出来?

人说:“呆子,你倒还记得那呆子啊。死了。也就是几年前吧。”“怎么死的?”“谁晓得,我们也不晓得。”屈指一算,呆子四十多岁死的。他这样文呆,至少可读书、听音乐,看电视、享口福。按说活着总比死去的好。

也难讲——或者,他只是到了有呆子妈疼他的地方去。



有理说理,有话讲话

王晔

“有理说理,有话讲话,哪个怕哪个啊!”他嗓音高昂、洪亮,语速急。若不是因为老重复那几句话,说的倒是头头是道。邻居们就常立在自家的阳台上点头:呆子说得对!呆子妈是个清秀女人,对谁都和气。呆子发病要喊两嗓子时,能看见她缩在里屋的小板凳上,一动不动,屏息静气。大家刚搬来时,呆子妈也喜欢在阳台上 and 邻居招呼两声。呆子在阳台上喊的次数越来越多,她就变得难得露面了。每幢楼极其相似,访客走错门的不少。有时误敲了呆子家的门,呆子也彬彬有礼。来人少不得抱歉自己走错,也顺便问一句,某幢楼到底是哪一排:“就是后头一排,就是后头一排,就是后头一排。”呆子是,无论人家找谁,他都这么连说三遍。来人听他连说三遍,心头狐疑,感觉苗头不对的有;糊里糊涂,道了谢,再走冤枉路的也有;不过,也有撞对的。转眼弟弟到了恋爱年龄。有女青年跟弟弟回家。女青年来得多了,就结了婚。那时结婚,不兴跟男家要一套房的,男家有一间屋就不错。所以,这一家三室一厅的房里,添一个新媳妇而已。弟弟有了媳妇,呆子跟在妈妈身后吵:“弟弟有,为什么我没有!”弟弟有了孩子,呆子竟然把要媳妇的心忘了。呆子喜欢那孩子,喜欢抱那孩子,抱得紧紧地,当个命!一年一年,呆子妈病了,走了。呆子没了最会照顾他的人。记不得是哪一年,呆子也死了。谁也没在意。是有人从外地回这新村,四处沉寂,想起呆子气出丹田的声音:“有理说理,有话讲话,哪个怕哪个啊!”不由得问:怎么不见呆子出来?人说:“呆子,你倒还记得那呆子啊。死了。也就是几年前吧。”“怎么死的?”“谁晓得,我们也不晓得。”屈指一算,呆子四十多岁死的。他这样文呆,至少可读书、听音乐,看电视、享口福。按说活着总比死去的好。也难讲——或者,他只是到了有呆子妈疼他的地方去。

董鼎山的洋妻子

(美)海龙

城密苏里留学。

那时世界大动荡,中国形势丕变;原来炙手可热的留学生留在欧美一时无望,而回国又充满了不确定。特别是,这些人已经到了适婚年龄甚至超龄。跟董鼎山差不多同龄的唐德刚先生在忆当年时写道,那时曾流行于留美学生间的理想目标是:洋车洋房、洋女为妻!

我猜想董先生可能是这个口号的践行者。

“完全不是!”——没想到老爷子断然否定了我的猜想。“我那时候是不敢追求中国女孩子啊!”

“为什么?哈!你如果知道当时的背景,就不会这样发问了”。提到这,老爷子来了精神头

儿。他说道:你想想,当年中国人能留学该多么稀罕,特别是女留学生。她们大多是达官显宦或暴富新贵的女儿,白先勇那样的不算有钱。那时候在美的中国人陡然失去国内经济赞助,情势一下子狼狈得很哪!连陈立夫在美国都要靠养鸡农场过活,李宗仁也是寒伦混饭,连胡适都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但中国的留学女孩却架子不倒,每天潇洒摆谱,称得上当时的时髦,是时代的气质女和物质女。她们曾经养尊处优生活骄奢,非富即贵,当然不屑知道柴米之贵和时代之殇。

董鼎山从密苏里毕业就来纽约撞大运找工作。有了工作和基本保障后就想到生计问题,开始到纽约当年杜威和胡适创建的华美协进社去参加活动,希望多遇到中国女孩。华美协进社是当年全美最风靡的年轻华人俱乐部。它主要为留学生和华人教授、高阶人员提供聚会和交流会;同时帮助他们找工作、讲学并接触美国上层。老一代的华裔学人几乎都跟它有某种缘分和交往。

但在那里的经历也打碎了董鼎山娶中国女孩的梦。凭他的条件和资质,本该能得到心仪的女孩。他

也遇到了不少愿跟他交往的姑娘。但是董鼎山被吓到了。

之所以被吓到,是因当年的这些等着钓金龟婿的公主们眼光太高。她们大多养尊处优颐指气使,让惨绿青年董鼎山感到尴尬不适。半个世纪后,老爷子谈到当年遭际仍然汗颜且愤然。其实,洋场出身的董鼎山并非没见过世面,但他不屑于跟有公主病的骄纵女孩周旋。她们不但物质化、偏爱攀比,以男子花钱多少来衡量对她们的爱有多少;而且要管辖男子,希望他们不止在家庭,而且在事业上由她们来安排命运。董鼎山受不了这个。他交往的女孩曾经直言学新闻没前途,让他改学工程或学医。

与中国公主相比,那时来美留学的欧洲人就更简单多了。而且,美国本地的女大学生也很少人有这般成熟的算计和老到的谋略。于是,董鼎山就调整了方向。他发现,来美国读书的北欧女孩最朴实,能吃苦耐劳善解人意。

瑞典和挪威籍的女孩多来自小镇和乡村,身材高挑气质天真贤惠。跟他交朋友时处处想着替他省钱;出门不愿坐当时堪称奢华的出租车,而愿意步行健身,不吃豪华餐宴而选麦当劳果腹,节俭且体贴。董鼎山娶了洋妻却享受了中国贤妻良母待遇。

几十年后他返国回乡,“文革”后的故乡人却在他洋妻身上发现了传统中国式爱家爱夫的美德。

董鼎山妻子学会了做麻婆豆腐和红烧肉,跟他相濡以沫相爱了一辈子。我每次去他们家跟董先生访谈写作,她都备好茶点鲜花,默默离开。后来熟了,她偶或轻声加入我们的谈话。凡熟识董鼎山者皆知她是一个现代难找的古代理想妻子的形象。

像是一对同命鸟,2015年5月,比他小8岁的妻子蓓琪去世。同年12月,93岁的董鼎山追随他爱了一生的蓓琪,告别了自己心爱的读者和世界。



十日谈

我与十二艺节

责编:杨晓晖

明起刊登一组《上海的早晨》,责任编辑:龚建星。

八年历练换来今日绽放

茅善玉

艺术中心作文艺工作座谈会5周年纪念演出,同样的时间,为的就是当初那份承诺。大漠黄沙是《敦煌女儿》永不磨灭的底色,整个创作期间,我们六度下生活采风,莫高窟是樊锦诗的职业生涯起点,也是上海沪剧院提升剧种高度和人文内涵的新起点。最初,专家给我们提出的意见非常犀利,但我

八年历练换来今日绽放

还是坚定了继续做、并且要做好的信念。用沪剧讲好一个故事很重要,但樊锦诗的人生故事并没有太多的戏剧冲突,我们创作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叙事还是叙事人上?最终我们决定叙事,文艺作品应该是多元化的,看完《敦煌女儿》应该给人不同凡响的感受,并非传统沪剧的家长里短。于是,我就开始请编剧、请导演。

启动创作工作后,我们首先找的是沪剧院自己的青年编剧李颖,她二话没说就答应

了,一个人在敦煌生活了20天采风。虽然今天我们的主创团队换了几次血,但最初的底稿是由她开始的,我很感谢她。如今,《敦煌女儿》已经在大大小小的剧场演出了五十多场,修改打磨不计其数。5月底《敦煌女儿》就要在十二艺节正式亮相了,我们沪剧院上上下下劲头十足,每个人都拼尽全力希望呈现最好的面貌。

沪剧虽是上海的地方剧种,但它曾经凭借《红灯记》《沙家浜》等戏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力,引起各剧种争相移植。沪剧要发展,势必要和城市一脉相承,与时代同行,求新求变,它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才会出现下一部产生全国影响力的佳作。现在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扶持达到了历史新高度,作为沪剧人,我实在是欣喜若狂,怎能不做点事情,趁着这个好时机拼一拼?